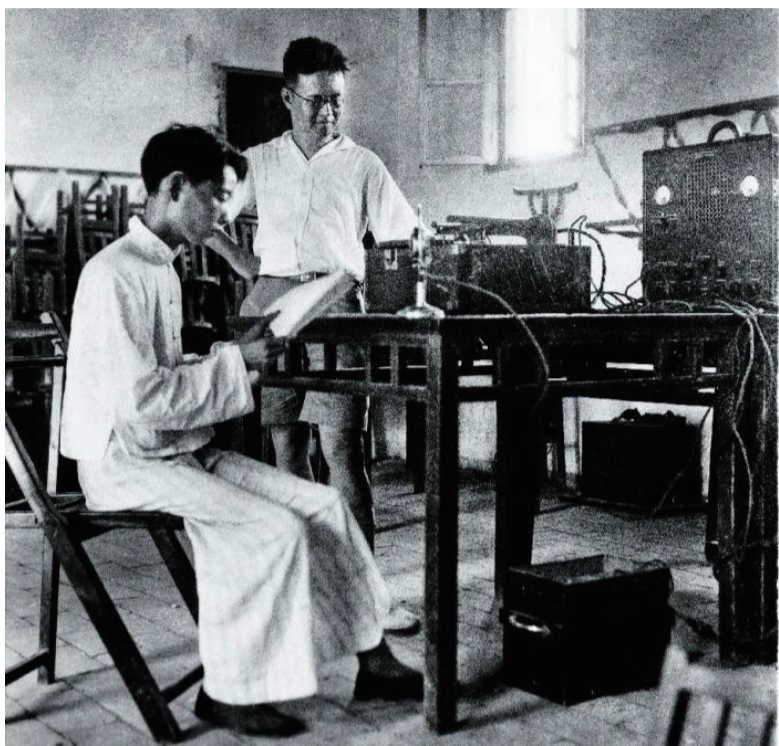


东西问·人物 | 赵元任：学贯中西， 民国时期最好玩的大师(下)



1934年7月，赵元任到安徽进行方言调查，罗常培和杨时逢带着从美国新买的录音设备同行。他们在安徽调查了六个县，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图为罗常培(右)用新的仪器录音进行方言调查。商务印书馆供图

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派赵元任负责创建语言组并担任主任。赵元任带人到两广湘鄂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用录音设备留下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还在各地寻找“发音人”记录方言资料。他带出了日后中国语言学界一大批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都成长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这样醉心学术的日子持续了10年，时不时受战争和其他杂事的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负责人的赵元任被迫和机构一起南迁至长沙。他担心自己的手稿、笔记、日记和4000多张照片的保存问题，便将大量珍贵资料寄给了在美国的大学同学罗伯特·金。

大部分资料都被安全保存下来，但他最喜欢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记》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另一本小说——《走到镜子里》的翻译原稿被战火烧毁。这件事给一向乐观的他造成了沉重打击，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捡起这本书重译。经历战乱，赵元任的心境开始变化，战争期间的颠簸，资

料的难以保存，田野调查的寸步难行，让他生出了寻找“安静书桌”的念头。

科学主义的落幕

“我是个现代主义者，我不属于任何党”。这是赵元任晚年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强调的一句话。为躲避战乱，他在1938年再度离开中国，选择气候不舒适，也没有太多学术根基的夏威夷大学任教，不久又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但这些地方最终都未能成为他的归宿。

1946年，赵元任的次女赵新那和女婿黄培云归国教书，他也计划回国任教，与家人团聚。但国内人士不断邀请他担任大学行政职务，让一直回避的赵元任陷入两难。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第二次邀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他决定暂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学教授，这一待就是17年。

从早年对音乐、天文等事物的喜爱中，赵元任已初露“科学享乐主义者”的一面。大女儿赵如兰说他对音乐的爱好是一种有逻辑的兴趣。夫人杨步伟也谈道，刚结识赵元任时，感觉他说笑话“没说出太大意思”，但大家都看得出他自得其乐。正如首都师范大

学学者袁一丹所言，赵元任在生活中体现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定居美国后，科学主义的实用性在中国退潮，但研究本身仍给赵元任带来心灵慰藉，他把语言学玩成了一项具备高超逻辑的娱乐。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大女儿赵如兰将外孙女送到赵元任夫妻处照看，赵元任突然对婴儿的声音十分好奇，将咿呀学语的“发言”做了详细记录并录音，很快写出了一篇语言学中少见的、关于婴孩语言的科学论文。

赵元任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因此国内对于赵元任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善。而他的温和、

不问政治，也使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模糊不清。但赵元任档案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宝库。外孙黄家林回忆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想出版赵元任的日记，但由于整理工作太过繁琐，只能先影印出版，供研究者参考。

当年，赵元任回国的机会少之又少。1956年，他在美国灌录唱片，每录到唐诗《长恨歌》《琵琶行》时就无法继续，忍不住落泪。直至中美关系缓和，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赵元任终于在1973年回中国大陆探亲。

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和祖国怀有浓厚的感情。他曾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他去到中国的一个中间站”，中国才是他的目的地。(完)



约1921年，赵元任在罗素在北京的院子里抖空竹。商务印书馆供图